

百年求是丛书 | ● 总主编 徐有智



在湄潭种茶的苏步青，牵羊过市的王淦昌，在赣江大堤上捉果蝇的谈家桢，
永兴茶楼中的李政道……这里展示的是浙大西迁中别具一格的画卷……

西迁浙大

李曙白 李燕南 等编著

Zhejiang University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百年求是丛书 | ● 总主编 徐有智

西迁浙大

李曙白 李燕南 等编著

Zhejiang University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迁浙大 / 李曙白, 李燕南等编著.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5

(百年求是 / 徐有智总主编)

ISBN 978-7-308-05304-4

I. 西… II. 李… III. 浙江大学 — 史料 IV. G649.28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7386 号

西迁浙大

李曙白 李燕南等编著

责任编辑 曾建林

封面设计 刘依群 俞亚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E-mail: zupress@mail.hz.zj.cn)

排 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杭州浙大同济教育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5304-4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072522

C 总序

Collection's Foreword

浙江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人文璀璨、英才辈出的著名大学。

我是1959年进入浙江大学读书的,1964年毕业留校任教,直到1993年才离开杭州到北京工作,1995年卸任校长,在浙江大学学习、工作、生活了三十多年。可以说,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是在这里度过的,一些重要的研究工作也是在这里完成的。

我对浙江大学怀有深厚的感情,更热爱这所学校所拥有的优良求是校风。每次我回到杭州,只要有时间,我都会回到学校,到当年学习、工作过的地方走走看看。每当这时,我仿佛又回到了自己记忆中熟悉的岁月。

一所大学的声誉,源自于它所拥有的深厚文化底蕴和优良的办学传统,也要靠它所培养的学生来充分体现它的社会价值。

从求是书院创办到今日浙江大学的一百多年办学历史中,浙江大学名师荟萃、大家云集,曾经拥有像蒋梦麟、邵裴子、竺可桢、马寅初、刘丹、钱三强等等这样杰出的校长、教育家。尤其是竺可桢校长,对浙江大学的贡献甚巨,在长达十三年的长校中,以其坚强的毅力、超凡的学识和卓越的教

001

总
序

育思想,带领浙江大学在艰难困苦的西迁办学中崛起,成为“当时中国最好的四个大学之一”。他的教育理念和办学实践至今仍是浙江大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同样,在浙江大学的理、工、农、医、人文社科等诸多学科领域中,都拥有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如马叙伦、马一浮、沈尹默、苏步青、王淦昌、夏承焘、贝时璋、张其昀、谈家桢、卢鹤绂等等,都可谓是开创学科、自成一家、独领风骚的名师大家。在浙江大学培养的众多毕业生中,既有像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陈独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夏衍,我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邵飘萍,著名的画家、敦煌学家常书鸿等等这样的文化名人;也有像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中国抗生素研究第一人汪猷,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叶笃正,“两弹一星”的功勋赵九章、程开甲等这样的科学巨匠。在浙江大学任教和就学的师生中,有160余人当选为两院院士,这在中国大学中是很少见的。正是由于他们的杰出工作和对社会的独特贡献,使浙江大学声名远播,也使浙江大学在中国近现代科技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

在浙江大学这块深厚的土地上,不仅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和科学大师,也在它百年办学中形成了堪称典范的求是精神。“求是”是浙大的校训,也是一代又一代浙大学人百年不懈的追求和实践。

所谓“求是”,就是“求真、求善、求美”。求是精神就是革命精神、科学精神、奋斗精神、牺牲精神和开拓精神。实事求是、严谨踏实、奋发进取、开拓创新是求是精神的应有之义,也是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技术科学发展的本质要求,是一切科学工作者、一切学人的共同追求和理想。

竺可桢老校长是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求是精神的典范。他在1941年发表的《科学之方法与精神》演讲一文中对近代科学与求是精神做过很好的阐述。他说:“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变,这科学的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他认为,“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一)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三)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今天重读竺可桢老校长写于六十多年前的这些话,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正是这种求是精神,使浙江大学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办学中,从创建、变革、崛起到发展的过程中,显示出其坚忍不拔的精神气质,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使其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历史关头始终走在前列,引领潮流。求是精神之所以伴随着浙江大学的百年风雨而历久弥新、发扬光大,是因为它凝聚着几代求是学人为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不懈追求与崇高理想,也传承了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为强国富民而奋争和振兴的历史传统,它蕴含着求真创新和为科学牺牲的精神。

从这个意义上说,浙江大学的百年沧桑,是中华民族从饱受屈辱中崛起的近代奋斗史的一个缩影,浙江大学的百年成就,体现了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步入现代发展和中华民族实现“科教兴国”的伟大宏愿。

今年5月,浙江大学将迎来110周年华诞。在此时出版“百年求是”丛书是件很有意义的事。这套丛书以传承求是文化,展示办学成就,提炼浙大精神,开拓浙大未来为宗旨,采用一书一题的撰述形式,力求从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多层次、多视角地介绍这所学校的历史、现状、传统、特色及其办校、治学、育人等方面的经验和成就,举凡名师大家、校园纪胜、学府精品、西迁史话、经典学科、名家名作、校友回忆、媒体记录等等,均在记述和收录之中,这对于很好地总结和回顾浙江大学一个多世纪的办学经验,梳理浙大的发展脉络,提升浙大的文化内涵,传承求是创新精神,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开拓性工作。

“百年求是”系列丛书第一辑9种书,书目和内容我都看了,也翻了几本,觉得编得很好,很生动。这里有我所熟悉的人和事,也有我所不熟知的人和事,特别是浙大的一些前辈先贤,像竺可桢老校长,我无缘聆听他们的教诲,然而看了他们的事迹,令我十分感动。追今抚昔,饮水思源,浙大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和作为,我想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前辈先贤打下的扎实基础,也是一代又一代浙大学人坚忍不拔、艰苦奋斗、呕心沥血所铸成的。他们是浙大的光荣和骄傲,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光荣和骄傲。在他们身上,承载着浙大不同时期的求是血脉,也凝聚着他们对国家、对民族、对母校的赤子之情。你可以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的崇高情怀。这是一部鲜活的浙大历史,对我们广大师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知校、爱校、荣校教育是一个很好的教材。

百年浙大,史料浩如烟海,典藏富如宝库。我希望能把这件有意义的工作继续做下去,做得更好。通过深入发掘,精析历史,彰显前人,激励后学,出版更多更好的精品,以彰显浙大百年成就,回报社会。

“求是系治学之本,创新乃科技之源。”值此浙江大学 110 周年华诞之际,殷切希望浙江大学广大师生高瞻远瞩、求是创新、永不怠懈、永不自满、与时俱进、开拓奋进,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是为序。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国科学院院长

(1988年至1995年任浙江大学校长)

2007 年 5 月

序

Foreword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的大学也面临选择。一些大学宣布解散停办,一些大学则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刺刀下屈辱求存,而浙江大学选择了举校迁徙办学的艰难长征。

从1937年11月11日开始,竺可桢校长率领全校师生员工及部分家属,携带大批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开始西迁,历尽艰辛,经过四次大的搬迁,行程2600余公里,足迹遍及浙、赣、湘、桂、闽、粤、黔七省,于1940年1月到达黔北,在遵义、湄潭、永兴等地坚持办学,直至抗战胜利,于1946年5月返回杭州。

浙江大学西迁办学历时8年半,和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日战争基本同步。浙大在艰难困苦的历史条件下,于炮火声中弦歌不辍,为中华民族保留和培养了一批科学文化精英;避居乡野而励志科学创新,因成果卓著而被被誉为“东方剑桥”;同时,在沿途的穷乡僻壤中播撒下现代文明的种子,留下长远的影响。学校也在流亡办学中崛起,谱写了中外高等教育史上“文军长征”的辉煌篇章。

西迁历程

一迁浙西天目山、建德

1937年8月13日,日军以重兵进攻上海。8月14日,日军首次轰炸杭州。南京、上海、杭州沿线敌机肆虐,战争空气弥漫东南各省。

为了使一年级新生能避开敌机袭扰,安心学习,竺可桢校长亲赴临安租借西天目山禅源寺余屋,作为新生的教学和生活用房。9月21日,一年级新生开始迁往深山丛林中的天目山,27日起上课。

在杭州,虽然敌机侵袭,警报不断,但师生们在日机狂轰滥炸的间隙,警报一解除,仍然照常上课。到11月5日,敌寇在浙江、江苏二省间的金山卫全公亭登陆,离杭州仅120公里,学校才决定举校迁到建德县。从11月11日开始,浙大教师学生分三批出发,在江干码头乘船,于15日全部到达建德。同时,凡是可以搬运的图书仪器,几乎全部搬离杭州,运抵建德。11月下旬,浙西形势危急,西天目山中的一年级新生有陷入绝境的危险,不得不再次搬迁。这部分师生经五天奔波,于11月底也全部到达建德。

建德在杭州西南约120公里,古称严州。浙大在建德上课一个多月,大致完成了这学期的教学。期间,南京国民政府沿长江向西迁移,同时,苏州陷落,日寇南侵,建德也不是安居之地。12月24日,也就是杭州沦陷之日,学校撤离建德,师生们离开浙江,走上了极其困难的赴赣旅途。

二迁赣中吉安、泰和

这次搬迁因路途遥远,加上日军进逼,难民如潮,尤为艰难。当时正值隆冬,师生们在寒风冻雨中溯江而上;战事突变,金华遭遇空袭,不得不临时改变路线;700多箱图书仪器在金华遭遇险情;火车没有着落,竺校长在玉山四处奔走周旋长达11天;师生被抛于乡野……全校师生饱尝困顿与艰辛。从1937年12月24日到次年1月20日,浙大师生从浙江建德出发,经金华、玉山、樟树,最终转抵江西

吉安,行程 752 公里,平均每天只前进 30 公里。

这次迁校的目的地本是泰和,由于战局发展迅速,浙大提前撤离建德,泰和的房舍来不及准备就绪。当时,吉安恰有乡村师范和吉安中学两所学校正在放寒假,学校就暂借这些校舍,抓紧时间,上了两周的课,接着进行期末考试,结束了这一学期时断时续的课程。

2 月中旬,吉安中学与乡村师范的寒假已告期满。于是,浙大师生告别吉安,分水陆两路南行 40 余公里,于 2 月 18 日迁移到泰和。

泰和又名白下,千里赣江自南往北穿越而去,赣粤国道沿江而行。浙江大学临时校址就设在泰和县城以西 2.5 公里的上田村,借用当地原有的书院、藏书楼,还有肖姓士绅的祠堂、祖屋办学。

浙大师生抵达泰和后,稍事安顿,便继续教学与科研活动。为了补足搬迁期间所受到的影响,课程和实验都比以前有所增多。学校在天目山时,曾试行的导师制,到泰和之后继续贯彻。由于偏居乡野,不像在城市教室楼群之间,有钢筋水泥的壁墙阻隔,师生之间朝夕相处,更利于导师与学生之间交流,相互切磋砥砺,关系也更为亲密。大局势纷乱急迫,这里的小环境却有条不紊。当时教育部派人到全国各地巡视,认为浙大是所有流亡迁徙大学中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坚持得最好的学校之一。

在泰和期间,一直跟随竺校长颠沛流离的竺夫人张侠魂,以及他们的次子竺衡,不幸因身患痢疾,缺医少药,竟至不治身亡。张侠魂女士在促成竺可桢入长浙大中起过重要作用。她关心学生,曾经慷慨解囊资助贫困学生,支持和参加学生组织的抗日爱国募捐,不仅是竺校长的挚爱,而且深受浙大师生的广泛爱戴,不幸病殁在浙大西迁途中,令全校师生痛心不已!浙大师生为张侠魂举行追悼会,教职工和学生 300 余人到会,全场呜咽。张侠魂和竺衡母子葬于泰和松山,他们永远留在了浙江大学的西迁途中。

三迁桂北宜山

正当浙大在江西泰和的教学、科研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时,1938 年 6 月下旬至 7 月初,江西北部的马当、彭泽相继失守。按照战局的分析,日军不一定会很快深入江西中部和南部山区,但是,一

旦南昌陷落,浙赣路中断,浙江大学的迁校将面临难以想像的困难。因此,浙大不得不又一次内迁。这次搬迁的目的地是位于广西北部宜山的宜山。

1938年8月13日,首批教职员先遣队离开了生活半年的江西泰和,出发前往广西宜山;8月19日,图书仪器装船起运;8月30日,教职员启程;9月15日,首批女生出发。学校的3辆校车分批轮流运送师生,西至茶陵,南达赣州,自此往后的路程,师生们都自行前往。至10月底,所有教职员和学生,除部分押运图书仪器等尚在途中以外,全部安抵宜山。学校于11月1日开学上课。

宜山(现称宜州)以前有所谓“蛮烟瘴雨”的说法,浙江大学师生到达宜山之后,首先遇到的就是疾病的威胁,其中最严重是疟疾。由于患者人数太多,学校所带药品很快用完,教职员私人所带药品都被借来应急救治。那时柳州、桂林都买不到疟疾用药,学校只好派人冒着炮火危险,远赴已经沦陷的杭州、广州购买。

宜山虽地处西南山区,也常遭日军飞机的空袭。浙大到达宜山后三个月,就遭到一次日机的猛烈轰炸。1939年2月5日,日寇出动18架飞机,先袭击了西门汽车站一带,而后对浙大标营校舍进行狂轰滥炸。敌机来回轰炸三次,投下燃烧弹、爆烈弹118枚之多,学校房舍及部分学生的衣物行李遭到重大损失。所幸大家躲避及时,仅有两名学生、一名校工轻伤。

浙大在宜山办学一年有余,1939年12月,因战事逼近,又向贵州迁移。

四迁黔北遵义、湄潭

自1939年11月底广西南宁陷落之后,在宜山的浙大已不安全,学校在派人去贵州遵义和云南建水等地勘察新校址后,最终决定迁到贵州遵义、湄潭。这次搬迁又是隆冬季节,到处雪淞冰凌,桂黔之间,山峦重叠,又缺车辆,浙大师生一路顶风冒雨,协助搬运图书仪器,经过艰苦的努力,学校顺利迁到贵州。

遵义地处黔北交通要道,北通重庆,有娄山关屏障;南接贵阳市,有乌江天险。名山胜水,雄踞要冲。遵义县城是行署所在地,也

是黔北的物资集散地。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这里,召开了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从此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成为中国革命历史的伟大转折点。时隔五年,1940年1月,浙江大学这支文化教育队伍,历尽千辛万苦,也长途跋涉来到这里,这真是历史的因缘际会。而浙江大学自井冈山下的吉安、泰和,经湘、粤、桂三省到达遵义的迁徙路线,恰好和当年中央红军从江西、福建出发西进,攻占遵义的行军路线相近,因此,后来才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考察浙大时,把浙江大学的这次西迁称为“一支文军的长征”。

浙江大学在黔北安居之后,校舍分为三处。校本部办公机构、文学院、工学院和师范学院的文科系设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的理科系设在湄潭;一年级设在永兴。湄潭为遵义所辖的一个县,县城在遵义以东约75公里。而永兴是湄潭县的一个集镇,也称永兴场,距湄潭县城15公里。

浙江大学在遵义、湄潭获得了六年半宝贵的安定时光,在这儿,著名学者教授群集,学子们得以受到良好的培育;科学研究气氛浓郁,科研成果卓著;学校得到迅速发展,在国内外声誉鹊起。

龙泉分校

浙大西迁广西、贵州以后,浙江、福建、安徽、江西、上海等周边地区的青年学生,由于交通或经济关系,不能去内地大学升学者越来越多。1939年1月,浙大派教务长郑晓沧教授和史地系陈训慈教授赴浙考察,筹建分校。经教育部批准,以浙江丽水的龙泉县坊下村为校址,成立浙江大学浙东分校,后改名龙泉分校。

1939年7月,龙泉分校首次招生,招收文、理、工、农四院一年级新生,录取正取生120名,备取生30名,并设置大学先修班。同年10月1日开学。1942年9月,分校增设师范学院。

分校原定只招收一年级新生,学生在分校读完一年级后须赴遵义总校继续学业。1941年夏分校增设二年级,从此学生可在分校读完二年级后再赴遵义学习。

1942年夏,日寇窜扰浙东,金华、衢州相继失陷。受到战局威

胁,龙泉分校曾于当年8月暂避至福建北部山区松溪县郊弥陀寺。不久日军退去,分校于同年秋返回龙泉。

浙江大学的崛起

1936年4月25日,竺可桢正式接任浙大校长。第一年,竺校长就对教授阵容、教学管理、学系设置、物质建设等方面采取了一些重要的兴革措施,使浙江大学迅速从动荡不安转到正常发展的轨道。尤其是教授阵容,经过聘回在郭任远任校长期间因不满专制治校而辞职的教授;延聘一批浙大急需的著名教授,特别是人文学科教授;又把刚从国外学成归国的青年学者如王淦昌、谈家桢等礼聘到浙大,加上前几任校长延揽的学者,浙大已是名师荟萃。西迁开始,虽然一路风餐雨露,历尽艰辛,但是由于竺校长平时尊重这些教授,倚重教授实行民主治校;一视同仁,不拘门派;还有他独特的个人魅力,深受师生敬重,所以这批教授都心甘情愿跟随浙大一再迁徙,并且一路有著名学者大师不断加入。这为浙江大学在流亡中的崛起奠定了最为重要的基础。

经历西迁,浙江大学不仅没有溃散,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

首先,学校规模有了较大发展。

浙江大学从杭州撤离时,仅有文理、工、农3个学院16个学系,到复员返杭时,已有文、理、工、农、师范、法、医7个学院,27个学系,1个研究院,4个研究所,5个学部,1个研究室,1所龙泉分校,2个先修班及1所附属中学。另外在遵义、湄潭有工场11所,农场占地300余亩。

学生人数也有大幅度增长。1936年时,浙大有学生512人。1937年10月统计,浙大有学生633人,部分学生因战乱离开学校,随校西迁的学生有460人。到1946年复员返杭时,在校学生已增至2171人。

其次,学校的科学研究一直没有间断,形成了浓厚的学术气氛,产生了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科研成果。

竺可桢的二十八宿起源的研究,王淦昌的中微子研究,谈家桢的遗传学研究,贝时璋的细胞重建研究,苏步青的微分几何学研究,陈建功的三角函数论研究,罗宗洛的植物生理学中微量元素研究,卢鹤绂的量子力学研究,王国松的电工数学研究,李寿恒的中国煤炭研究,钱令希的悬索桥理论和余能定理的应用研究,钱钟韩的工业自动化研究,苏元复的萃取理论和工艺的改进,黄翼的物理心理学研究,陈立的智力测试与人格测试的研究,孙逢吉、吴耕民、蔡邦华、罗登义等在农业科学方面研究,都取得了杰出成果,有些还是处于世界科学前沿的重大发现。

1944年4月和1944年10月,英国科学史专家、剑桥大学生物学家,同时担任英国驻华文化与科学协作代表团团长的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曾先后两次访问浙大。第二次访问时,原定在浙大逗留三天,后来认为可参观的东西和可看的论文实在太多,不得不一再延后,在浙大访问8天才离校。李约瑟对浙大在非常艰苦条件下的学术空气之浓、师生科研水平之高,十分惊叹,在与浙大师生的谈话中,曾数次盛赞当时由清华、北大、南开大学在云南昆明联合办学的西南联大是“东方的牛津”,而浙大是“东方的剑桥”。

浙江大学的教授,由于这些突出成就,很多都成为各自领域中的翘楚。据不完全统计,西迁期间在浙大任教,后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及以后的院士的就有28人。

再次,进一步明确了浙江大学的办学方针和培养目标,确立了“求是”校训,培育了一批社会栋梁和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和有益的经验。

竺校长认为,“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主要是培养“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即各界的“领袖分子”,以自己的学问和技术为国家民族作最大的贡献。在西迁过程中,竺校长把培养人才与拯救中华、转移国运的神圣使命结合起来,要求浙大学生“自觉其所负使命的重大,努力于学业、道德、体格各方面的修养,而尤须于缜密深沉的思考习惯”。形成了“学业”、“道德”、“体格”全面发展,并且具有独立思考能力,这一浙江大学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思想。

在竺校长倡议下,学校在广西宜山期间,将“求是”定为浙江大学校训。竺校长解释说:求是精神就是追求真理,忠于真理,不盲从,不附和,不武断,不专横,而“大学最大的目标是在薪求真理”。

浙江大学以求是精神为核心的优良校风,对学校日后的办学和长期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在中国高等教育界树立了独特的文化品牌。同时,也为西迁办学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培养出一批杰出人才。

当时在浙大求学,日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的有26位,其中包括“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叶笃正,院士夫妇谷超豪、胡和生等,还有日后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

浙江大学的西迁,还在闭塞落后的山区输入了东南滨海地区相对现代的文明和科技文化气息;每到一地,师生必竭尽所能,为当地人民做有益的实事,对地方科技文化和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经历西迁,浙江大学从此由一所地方性普通大学,一跃成为最著名的几所全国性大学之一。

(本文原名为“流亡与崛起——浙江大学西迁办学纪实”,代序)

编 者

2007年5月

西天目山 △ 藻溪 杭州
于潜 分水 桐庐

1937年11月，敌在全公亭登陆。学校迁建德。西天目山到建德。

1942年夏，敌扰浙东，浙大龙泉分校师生迁福建松溪，同年仍迁回龙泉。

1937年12月，敌陷杭州。浙大师生历尽艰险，分批经金华、南昌、樟树到达吉安。有的步行经常山至玉山，再去吉安。

1938年2月，浙大师生迁秦和。

1939年12月，敌扰桂南。浙大师生克服交通阻塞等困难，开始西迁遵义、湄潭、永兴。直至抗战胜利，浙大在贵州坚持办学达七年。

1938年7月，敌险九江。浙大师生分水陆两路几经颠簸，于10月底到达宜山。部分学生历40天步行去宜山。



竺可桢校长

求是精神
竺可桢题

竺可桢亲笔题写的“求是精神”